



周天勇：稳增长需要纠正的三个误区及其对策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2023 年经济增长要比 2022 年反弹，国内外各种不同预测在 4 %到 8%之间； 2023 年是 4.5%还是 6%？也很不确定。下行压力供给方面来自于企业家信心能否恢复和遏制住产业继续向外转移，需求方面则决定于居民收入能否提高而增强消费支出、国际直接投资能否稳定流入和出口能否平稳扩张。2022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对此，一些学者和机构提出了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的各种对策，但有一些可能需要商榷。笔者对主要三个对策建议误区进行辨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修改和补充建议。



仅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实现中高速增长

用现代经济学索洛算法预测，未来 15 年中国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 -1.1%，资本年均增长率大约 4%，资本和劳动投入产出对增长的贡献比平均分别为 0.5 和 0.5。则投入产出经济增长部分年均为 1.45%。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若与 1978—2019 年 0.7% 相同，则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 2.15%。

国内外大多数机构和学者以此算法的预测，低增长结果大体相同，大家都心知肚明。要使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出路。因疫情三年拉低前期速度的影响，如果实现经济翻一番，未来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达到 4.9%；还有实现初步现代化强国目标，则 GDP 增长速度至少需要 6%。这样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合理增长速度就需要在 3.45%—4.55% 之间。

于是，国外一些友好学者，特别是国内一些机构和经济学家提出对策，即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积累人力资本、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提高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将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有的经济学家还提出，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提高到 80%。

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观察全球第一和第二方阵主要创新国家，截止 2019 年前的半个世纪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最高的韩国平均为 1.7%，占 GDP 增长平均比率

最高德国为 53%。根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数据, 1971—2019 年, 日韩法英德美第一二方阵创新型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除了韩国外, 其他在 0.51%到 1.05%之间;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占 GDP 增长比率, 除了德国外, 其他国家在 21%—33%之间。而中国 1978 到 2019 年, 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 0.7%, 占 GDP 增长比例仅为 7.4%。

学理研究的结论, 也不支持加大创新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加速 GDP 增长速度推断。经济学家琼斯根据 1980 到 2000 年欧美数据分析得出结论: 研发人员投入的增多, 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加速。另一经济学家菲斯佩奇对此评论, 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状态是一平缓的趋势。观察日韩法英德美 1971 到 2019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状态, 呈现的是平缓并略微下行的趋势。

结论是, 将中国未来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年均提高到 3.45%—4.55%的对策建议, 实现的概率很小。

只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不能稳定经济增长

1. 这一对策建议的由来及其与体制国情不相适应

一些学者判断, 在疫情后恢复性高增长, 在 6%甚至 8%以上, 未来年均也有可能保持这样的速度。他们认为, 生产过剩和增长下行的原因, 主要是居民有货币持有偏好不愿意消费, 资本拥有者有储蓄偏好而不愿意投资, 国民经济运行中货币流动性不足。应当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思路,

补充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用扩大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以刺激，使实际低迷的增长速度恢复到潜在合理的增长水平上。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配置资源的基础机制仍然是市场，国家需要纠正的是市场货币持有和储蓄偏好这种扭曲和失灵，从而宏观层面采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和刺激。因此，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运行的货币流动性不足，既是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是如补充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流动性，就是经济增长的潜能。

然而，体制长期渐进转轨国家，下行主要由供给方面生产力浪费闲置低利用和需求方面收入支出循环扭曲梗塞造成。加速经济增长的潜能，在于通过体制改革对闲置收缩低利用的生产要素、消费需求和财富价值加以释放，使低经济增长获得新动能，使速度回到合理的区间。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如人口流动户籍管制、企业贷款所有制歧视、农村土地房屋无资产价值等体制扭曲问题，进而无法盘活和释放经济增长的要素、需求和溢值等潜在动能。

2. 三次高增长并不主要由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所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 1978 年、1992 年和 2001 年三次高增长启动，其并不主要由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所发力，主要由“联产承包、乡镇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发育市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化改革方向、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组成部分、日韩新和港澳台等境外企业及投资进入”，“加入 WTO、城镇住宅商品化和土地有偿出让”等三次大力

度改革开放推起。货币规模扩张只是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不动产财富增加需要更多其供应所致，而财政政策只是在第三次高增长中作为配角发挥了它的作用。

仅仅依靠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结果可能带来的是国民经济的滞胀。因为其既不能理想地支撑住经济增长速度，过度投资形成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的更加过剩，也会造成严重的消费物价上涨，或者资产价格暴涨，甚至生产与债务链的危机。2009 年的 4 万亿元刺激，就给后来的经济造成了需要消化多年的生产过剩。

结论是：主要由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治标不治本，不可能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在合理区间。并且，国民经济可能会陷入既生产过剩、失业高企和增速滞缓，又消费品、生产资料和不动产价格上涨的两难处境。

房地产可以稳增长希望不大

一些学者和机构认为，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关联能源、建材、建筑安装、装修、家厨卫俱、物流等诸多上下游和横向关联产业，对策建议为强力启动恢复房地产业，重新成为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值得商榷。

人口增长停止和老龄化，使住宅供给发生逐渐迭代式大于需求的格局性变化。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初，青年人数量扩张性住宅需求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而独生子女人口结构使得两三代老年人遗留给独生子女家庭的房

产迭代式增多。

目前城乡住宅供给已经严重过剩。截止 2022 年 12 月，若在建面积 63 亿平米竣工，城镇住宅存量将达 473 亿平方米。每百平米为一套并居住 3 人，城镇住房可以容纳 14.19 亿人口居住。农村除去 1 亿拆迁户籍居民在城镇有房外，其余农村户籍居民拥有的农村住宅总面积为 270 亿平方米。城镇住宅闲置率在 25%左右。城乡相加住宅面积为 740 亿平米，可容纳 23.4 亿人居住，其中农村住宅闲置或者空置率 40%。

未来的房地产税开征预期，对房屋资产投资性购买形成抑制。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房地产税是市县级政府财政的基础来源，一般占其总收入的 60%左右。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水利建设到中后期，卖地财政逐步走到尽头，若要地方财政可持续，房产税无论早晚，必须要开征。

未来城乡住房供需变动格局为：城乡居民居住和投资数量高速扩张性需求结束，向租赁居住、地点调换、品质升级和二手购买等结构性需求转变。农村青年和大中专学生就业许多需要租赁居住，大多退休老年人以现有住房进行地点、面积、环境和现金的置换，中年人租赁换成自有住宅，积累了财力的居民进行地点就近和房客品质的升级式替换。

结论是：启动房地产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可能会落空，硬扩张的成效为负。无论是开发商，还是居住需求者，还有房屋资产投资者，对未来住宅的需求、价格和景气，总体上不会看好。行政和宏观调控强行启动一次房地产热，将会造成更严重的住宅供给过剩。

对稳增长的对策建议

1. 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建议

(1) 稳定创新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 0.8% 左右，争取提高到 1%。防止体制扭曲可能造成未来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特别是避免其负增长。创新成效如何与体制机制相关度较高。如计划经济体制期间，据格罗宁根大学计算，中国 1957—1977 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 -1.21%；特别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的数据，1971 年—1977 年间其平均增率为 -2.04%。

(2)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需要体制改革和开放交流

形成社会为主和政府有为的创新生态体系。个体原创发明、院所团队攻关、企业主体转化和政府战略有为相结合，上下左右齐心，各个方面发力，充满创新活力，在科学原创、技术发明、团队组织、技术转化、科技融资、技术产业化等各环节和各个方面，形成既有参天大树，还有灌木丛生，更有青草遍地的创新生态体系。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645

